

本刊10月號推出俄羅斯改革專輯，得到讀者的熱烈反應。在本期「批評與回應」中，有四位作者評論這組文章，在本欄中也有回應。可以看到，中國學者之所以關心蘇聯解體後的俄國面臨何種政治、經濟及社會難題、又是如何應對的，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對90年代以來中國自身問題的深切關注，特別是思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的發展是否會進入新階段。而本期的東亞研究專輯，則提供了另一個參考視角。

時光如流水，轉眼新年將至。在此，本刊編輯同仁向各地作者、讀者問候新年好，並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繼續支持我們。

——編者

結構、行動者和歷史

拉特蘭的〈解體與恢復——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二十一世紀》2004年10月號）揭示出近十餘年間俄羅斯權力運行機制的起伏過程：從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解體中出現過無政府狀態，接着葉利欽選擇性地採用部分「舊制度」以鞏固大權，產生出一個「無政府狀況與威權主義的危險混合體」，最後普京又建立起所謂的「垂直等級結構」，以及期待中的強人主導的「開明專制主義」。拉特蘭勾勒出這條線索，目的在於描述某種「轉型」，而要理解轉型，最有效的視角還是結構分析。如此，我們可以理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解他在行文伊始肯定「系統解體」、否定「革命」與「過渡」的目的就在於奠定本文的結構分析範式。

循着結構的理路，我們來看十餘年來前蘇聯至俄羅斯的權力機制變化，確實能明顯覺察到威權體制在民主門面內的潛藏和湧動。據俄羅斯《新聞時報》2004年10月21日報導，普京新近委任的「總統代表」克瓦什寧在西伯利亞聯邦區宣稱要用「毛澤東思想」進行基層自治改革，認為「垂直權力體系不應只包括市長，還應包括村鎮的領導幹部」。可見俄羅斯式垂直權力體系在人為操縱下正不斷延伸、滲透。普京自己也以幹練正派的形象深入人心，甚至被流行歌曲演繹成俄羅斯女性「最想嫁的人」。這兩個小例子正面地折射出拉特蘭在文中所要分析的「（權力）恢復」。

拉特蘭分析論述的不足之處在於無法說明俄羅斯政治轉型過程的整體歷史定位。由於身處歐亞大陸交界並在西方文明與斯拉夫獨特性之間徘徊，俄羅斯早在沙皇彼得一世、葉卡捷林娜時代就有發展道路選擇的兩難問題。從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到普京，政經權力

的轉移過程在長時段、多層次上看，也只是俄羅斯在斯拉夫民族與西方文明、共產主義與自由資本、集權與民主、計劃與市場的模式選擇中改轍易道的重要片斷和精彩層面。若要完整且更準確地理解權力的轉移和變異，及其與其他歷史因素的作用，需要我們跳出政治看政治，超越民族看民族。

鄭振清 北京
2004.10.24

「化農民」的努力

閱讀曹立新〈鄉村建設運動中的《農民》報〉（《二十一世紀》2004年10月號）一文，我期望它能解答我心中的困惑：農民是可以啟蒙的嗎？啟蒙的切入點在何處？

該文用詳實的資料介紹了《農民》報的主辦者在20、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化農民」的努力，而《農民》報在「化農民」方面的效果如何，作者談得相對較少，只在文末承認，這是一幕悲劇（歸因於「救亡壓倒啟蒙」）。我注意到，該文曾提到《農民》報同仁為了推動農民自己辦報，協助農民創辦了

《平校畢業同學會周刊》，但只辦了一年就半途而廢，至於其中原因，則語焉不詳。其實這個問題很重要：農民到底是需要別人不斷去啟蒙的，還是給他們一定條件，他們就能自己啟蒙自己？

在「農民的百寶囊：『農藝』新知與民間『遊戲』」一節中，作者曾提到《農民》報的「農藝」一欄比較受歡迎，其中透露出的消息值得重視。我們的民族是實用主義的，「實用」可能就是啟蒙的切入點。農民啟蒙和鄉村建設運動為甚麼會讓位於土地革命，就是因為農民講究「實用」。1978年後中國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也是因為它「實用」。

美國人類學家薩林斯曾指出，即使與西方文明不期而遇，夏威夷人仍是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去操演這次接觸的。但由於兩者存在一個並接結構（類似前面提到的「切入點」），夏威夷文明最後實現了轉型。這些論斷對中國的啟蒙問題是有借鑑價值的。

最後是一個主動權的問題。知識階層如果不是處於相對強勢的地位，啟蒙就會變為反啟蒙。我們不應該忘記華老栓的「藥」，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階層的命運帶來的教訓。

王少輝 汕頭
2004.10.30

超越整體主義的認知方式

侯艾君在〈流放車臣人：原因、事實與後果〉（《二十一世紀》2004年10月號）一文中，揭示了斯大林主義極權統治的

又一罪惡：1943-44年對整個車臣民族的集體流放。斯大林極權統治的性質、成因與後果已經眾所周知，不了解的只是細節與具體事實而已。因此，讀侯文時，我所關注的是蘇聯政府的認知與行為方式。斯大林提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時，面對現實國際環境而有深切的不安與焦慮，對車臣等民族的不信任與不安感也隨之而來。但對一個久已存在的民族實行整體性的流放，與納粹試圖整體性地消滅猶太人一樣，不僅體現其種族傲慢，更體現出蘇聯政府整體主義的認知與行為方式。

我們固然可以以整體的方式去看一個民族，但是，應不局限於此而應有所超越。近代文明的一大進步，是將個體作為一種存在並以個人承擔自己的責任或接受法律的懲罰來取代封建時代的連坐。即使有相當數量的車臣人有通敵行為，也還是需要以個體主義的眼光去審視，更何況也有車臣人成為反法西斯英雄。近年來由於車臣恐怖份子連續製造恐怖事件，特別是別斯蘭事件，人們易陷入整體主義的認知方式：對車臣人整體地敵視、警戒或鄙視。我認為，這與蘇聯政府採取集體流放的認知—行為方式本質一致，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把恐怖份子作為個體與車臣人民區分開來，把「黑寡婦」們作為一個個的個體去看，去研究她們的仇恨與痛苦，去努力撫平每個車臣個體的心靈創傷，才可以避免歷史上的錯誤，而且能夠對恐怖主義釜底抽薪。

丁松泉 杭州
2004.11.3

結束過去 開關未來

在〈俄中關係中的「領土要求」和「不平等條約」〉（《二十一世紀》2004年10月號）一文中，中俄兩位學者令人信服地分析到毛澤東1964年7月10日的強硬談話實際上是一種迫使蘇聯領導人緊張從而讓步的策略。儘管，毛澤東曾屢試不爽地使用過這一招，然而在領土關係上不僅失效，反而適得其反，引起了蘇聯不惜使用一切武器進行毀滅打擊的威脅。毛澤東以算歷史帳的姿態談「領土問題」及「不平等條約」，本質不是要收回領土，而是在現實政治談判中佔據主動地位。「領土問題」與「不平等條約」也相應地成為中蘇關係正常化中的最大障礙之一。

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時，在對中蘇間「領土問題」、「不平等條約」等一系列問題算清了「歷史帳」之後，鄧小平睿智地提出應當「結束過去，開關未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及相關邊界條約的簽訂，正是在這一精神指導下的政治雙贏的均衡合理的方案，對中俄兩國關係具有極其重大的建設性意義。

在平靜、客觀、不帶任何成見弄清楚了中蘇兩國間領土問題之後，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採取措施進一步釐清雙方歷史認識中的誤區，加強了解，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共同努力開創俄中關係發展的新局面。

付海晏 武漢
2004.11.5